

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数字化发展研究

——以政策演进为视角

许 峰 董玉洁 詹崔婧

摘要:城市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综合载体和实践单元,城市文化作为其关键要素,不仅是城市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数字浪潮中凸显和表现城市竞争力的特有指标。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正式发布,文化数字化在国家数字化推进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随着2024年《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迈入了以城市系统为核心,强调整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的新阶段。这一政策为城市文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城市文化的数字化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梳理并分析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政策节点,以及相关政策如何影响并推动城市文化数字化的进程,对于把握全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城市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城市文化;文化数字化;城市数字化转型;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文化生态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1.006

一、引言

城市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已渗透到城市的各个层面。新技术革命与城市化将成为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核心驱动力^①。2021年,上海市率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标志着“城市”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开始受到关注^②。2024年5月,《国家发改委 国家数据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下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指出城市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综合载体,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③。城市数字化转型,作为技术革命与城市化结合的实践,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文化的综合影响力日益增强^④,具有独特性的区域文化被视为地区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其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⑤。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中,深度开发文化资源成为国家和地区获取竞争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文旅融合研究专项“数字化赋能山东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对策研究”(22BLYJ09)。

作者简介:许峰,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济南 250100; tourism@sdu.edu.cn);董玉洁(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202120490@mail.sdu.edu.cn);詹崔婧,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qz.zcj@163.com)。

- ① Wang Q.,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s, Blueprints and Patter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8, 9(3), pp. 349-353.
- ② 《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公布》, http://www.cac.gov.cn/2021-01/08/c_1611676479346954.htm, 访问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http://www.cac.gov.cn/2021-01/08/c_1611676479346954.htm, 访问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 ④ Bucci S., Schwannauer M., Berry N.,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Care”,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9, 92(2), pp. 277-297.
- ⑤ Siddique S., “Evacuee Cinema: Bombay and Lahore in Partition Transit, 19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23-42.

优势的关键^①。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下称《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中提出^②，“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基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为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夯实基础^③,文化数字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文化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关键时期。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中探索文化数字化路径,推动城市文化发展,取得数字化竞争优势,已成为数字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本文将借助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入分析城市文化形成机制,梳理相关政策发展脉络,厘清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历程和城市文化数字化的阶段性特征。文章将重点探讨全域数字化转型阶段城市文化数字化的特点与趋势,旨在为数字中国建设中城市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城市文化与数字技术发展关系的逻辑构建

(一)城市文化及其形成机制

城市,作为文明的孵化器,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更迭与兴衰^④。传承文化始终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更新成为传承城市文化、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⑤。19世纪末城市学兴起,“城市文化”在国内外研究中逐渐被提及;约半个世纪后,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研究开始出现。城市文化本质上是文化的组成单元,对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机制的讨论应当基于文化的固有属性展开。

首先,文化具有社会性。文化是特定生活方式的形塑与聚合,不仅体现在成型的艺术与知识中,更蕴含在习俗与日常行为里。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深植于特定时空的“活文化”,记录某一时期多元文化形式的文化记录,以及连接“活文化”与历史时期的“选择性传统”^⑥。城市是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表现,人类活动是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来源^⑦。文化是人们在城市中进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和现实体现^⑧,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见证。芒福德强调,城市的独特功能在于促进和丰富人类活动与交流,这对文化发展至关重要^⑨。居民日常生活不仅塑造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对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等文化要素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孕育出独特的城市文化。日常的生活方式、生产行为和休闲娱乐等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础。

其次,文化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所处情境的变动会影响文化的构建和发展。换言之,文化是不断生成的,这是文化发展的根本特征^⑩。城市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特殊形式,其形成过程动态且持续,并与城市环境紧密相关。不论处于何种发展水平,城市在环境、交通、治安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周期性更

① Sun F., Ye C., Feng X., “Fostering 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Unveiling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Dialect Group Culture”,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23, 15(3), pp. 1-26.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③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全文)》, <http://www.china-cer.com.cn/zhengcefagui/2022052318622.html>,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④ 苏静、陆林:《城市文化街区功能演化研究》,《人文地理》2010年第2期。

⑤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582页。

⑥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105页。

⑦ 张鸿雁:《人类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论——城市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新视角》,《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⑧ 吴俊忠:《城市文化学初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⑨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第583页。

⑩ 石奕龙:《斯图尔德及其文化人类学理论》,《世界民族》2008年第3期。

新是城市的必由之路^①。每一座城市文化都在历史与现代交融中产生和发展,传统元素和新兴内容共同形成不断生成和更新的城市文化体系,历史延续性和现代创新性并存^②。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是城市文化的基础构成和持续演变的动力。城市文化被赋予积累知识和传播价值等多重功能,是活跃且自觉的文化存在。

直至今日,学界对城市文化的定义尚未统一,但普遍认为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源自人类活动,即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构成城市文化核心,也决定城市文化发展。在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中,居民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化的消费者,文化的生产不仅源于居民的主动创造,也蕴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行为中^③。城市作为一个复杂且有机统一的社会实体,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演变而持续发展^④。这也意味着城市文化演化伴随和贯穿城市更新的始终,无论城市处于何种社会经济水平或发展阶段,城市文化都遵循着内在的文化形成与发展机制持续演化。

(二)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文化与技术

城市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性组织文化,是构成城市的无形要素,见证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并随着城市发展进程不断变迁。城市是城市文化孕育和发展的环境载体。文化生态学借鉴生态学基础逻辑,将文化内外部关系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探究文化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⑤。斯图尔德指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发展的方法论,着重关注人类社会对环境的适应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强调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可从其所处环境中找到原因^⑥。

“文化内核”(culture core,又称文化核心)是文化生态学最关键的概念,指文化与环境相互适应过程中最相关的部分。斯图尔德进一步提出,“技术经济”是文化核心的基础,也是文化变迁的决定要素。在文化生态学语境中,技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首要因素,它们相互影响并引起文化变迁^⑦。文化总是历史的、可变的,与技术进步紧密相连,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将推动文化形态更新。城市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全维度渗透城市生活的过程,会带来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迁和城市文化更新^⑧。此外,重视“过程”是文化生态学的关键特征^⑨。数字技术的应用引起了城市中时间、空间、人际互动等传统概念的转变和重构,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社会认同和城市文化形态^⑩。随着城市数字化不断深入,城市文化、技术发展和城市变迁紧密交织,这是城市居民适应城市数字化的表现。然而,城市的数字化建设是如何引起城市文化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城市文化变革,还需结合城市数字化的具体过程来分析^⑪。

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显著提升其普及程度,使技术、城市融合呈现出巨大的阶段性差异。城市文化不仅包含空间布局和建筑景观等“硬件”,也涵盖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等“软件”^⑫。城市数字化转变

① 马歇尔:《城市设计与演变》,陈燕秋、胡静、孙旭东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② 王志刚:《推进文化科技创新 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求是》2012年第2期。

③ 黄昌勇、解学芳:《中国城市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④ Lazzarini L., *Everyday Urbanis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1999, pp. 255-266.

⑤ 崔明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⑥ 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52页。

⑦ 高丙中:《文化生态的概念及其运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⑧ Meng T., Yu D., Ye L., et al., “Impact of Digital City Competitivenes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Evidence from China’s Emerging First-tier C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 10(1), pp. 1-26.

⑨ 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⑩ Hurova I., Shkurov Y., “Man in Digitized Urban Socio-cultural Space”, *Anthropological Measurements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23, 24, pp. 75-87.

⑪ 朱利安·H·斯图尔特、潘艳、陈洪波:《文化生态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⑫ 曾伟:《现代城市的文化发展与品质提升》,《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是全方位的过程,会重塑个人在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上述要素在城市发展中的参与度和数字化水平,都会直接影响城市文化发展。因此,厘清我国城市数字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系统理解城市文化数字化的发展历程,对充分识别和把握城市整体数字化所带来的文化发展机遇,研究我国城市数字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文化数字化的内涵与阶段划分

(一)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文化数字化的内涵

随着数字技术在各行业中的全面应用,各国相继将数字化转型确定为国家战略^①。在传统语境下,“数字化转型”是以技术发展和应用为核心,通过数字技术主导,推动实体变革与提升^②。城市作为高度系统化的组织实体,不能单纯依赖技术变革,只有手段、模式和理念都实现系统转变,才能称之为数字化转型^③。有学者将“城市转型”与“数字化转型”概念相结合,定义城市数字化转型为“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④,此为狭义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而广义概念则涵盖数字技术整合应用至城市环境和日常运作的全流程,其本质是随数字技术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基于我国城市数字化实践,讨论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指广义上的城市数字化整体过程,“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狭义上的深度变革过程。

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居民生产、生活的渗透是一个渐进且复杂的漫长过程,每一时期的文化都根植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中^⑤。斯图尔德在文化生态学理论中强调,文化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技术发展在其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⑥。城市文化也随着城市数字化转型进入数字化发展。爱乌尔德阐释道:“文化进化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并且是普遍化的一个特殊状态。”^⑦这意味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变迁,一旦达到某种普及程度时就会触发城市文化变革。与广义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相对应,由数字技术发展、应用所引起的城市文化变革,即城市文化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相适应而产生的变化,均属城市文化数字化。这也表明城市文化数字化不仅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形式和特征等维度上与其高度对应。

(二)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划分

城市发展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城市转型往往基于前序成就,在时间和内容上存在重合与多元并行,我国城市数字化过程也不例外。通过梳理国内外数字发展历程及相关研究,城市数字建设可总结为“数据层—基建层—服务层—用户层”^⑧四层架构。数据层和基建层以技术为核心,专注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字平台搭建;服务层则标志着技术应用向服务提供转变,体现了从技术导向到需求引领的演进,其中“人”的因素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用户层的到来,则预示着城市数字建设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新阶段,城市被视为一个系统整体,将发生质的飞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数字建设所涉及的层面和具体内容并不相同,这些都是数字化转型必经的过程。

① 许吉黎、叶玉瑶、郭杰等:《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理科学》2024年第4期。

②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 28(2), pp. 118-144.

③ 龚艺巍、谢诗文、施肖洁:《云技术赋能的政府数字化转型阶段模型研究——基于浙江省政务改革的分析》,《现代情报》2020年第6期。

④ 郑磊:《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路径与方向》,《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

⑤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74页。

⑥ 朱以青:《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⑦ 爱乌尔德:《文化进化论》,钟兆麟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0页。

⑧ 许竹青、骆艾荣:《数字城市的理念演化、主要类别及未来趋势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8期。

由于经济、技术和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具有时空差异,导致城市文化数字化也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以时间为维度进行清晰的阶段划分具有挑战性。回溯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历程,技术发展与政策指导始终是推动城市数字建设的两大核心动力。因此,结合中国城市数字建设的实践脉络,选取具有显著阶段性特征的两项政策: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划分依据,探讨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及其中的文化数字化进程。

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阶段特征与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

(一)初步探索:数字城市与城市文化数字化

数字城市概念的核心在于构建以数据信息为基础的虚拟空间,其间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的主要形式是对城市中有形文化要素的数字化映射。21世纪初期,中国开始进入“数字城市”建设阶段。2006年,国家测绘局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纳入国家基础测绘项目,正式在全国范围启动数字城市建设^①。在此阶段,各地以地理空间信息为重点,通过3D测绘和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全面采集与处理城市信息,完成各级城市空间信息的数字构建,为城市数字建设的深入和城市文化数字化萌芽奠定了基础。数字城市时期,城市数字建设主要是投射和记录城市地理信息和空间构成,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物理空间进行数字复刻,重点关注物质构成与空间结构,尚未形成对城市文化深层次、系统化的认知^②。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有机构成,在数字城市建设阶段,文化数字化仅在城市地理空间建构中有所涉及,是被动、无意识的,并未在城市数字化中引起关注。具体表现为,在数字信息采集和投射中,部分蕴含在城市物质构成中的人文景观等文化要素作为城市机体的一部分被记录。此时,数字化的对象是城市的空间构成和地理信息,例如空间格局、街道、构筑物等,未以整个城市综合体为主体,城市中的文化要素也未作为独立对象参与到数字化进程中。换言之,在此阶段,城市文化数字化是作为数字城市的附属部分被动进行的,单纯以技术主导、自上而下推行。数字化仅限于作为城市“硬件”的部分文化要素,对城市文化发展几乎无推动作用,城市文化数字化尚未成为独立议题。

(二)整体发展:智慧城市与城市文化数字化

智慧城市的数字化特征是以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运行,构建智能化城市系统,其间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城市文化要素的数字化记录和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数字开发,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中应用逐渐拓展。自2008年起,“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推行。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上,我国也以“智慧城市”为目标,致力于以数字技术强化城市机能。智慧城市的核心是通过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智慧化提升城市治理与服务^③,以建立智慧城市网络体系为阶段目标。数字技术被系统应用于城市运行诸层面,最大程度地构建智能化城市系统,引导生产者、城市居民等扩大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生产效率和生活智能化水平。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数字技术仍占据主导地位,城市数字化发展呈现出自上而下、政策引领的特点,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尽管智能化和系统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城市开始被视为系统化的整体,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日常运行和治理中^④。

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在城市中的持续渗透,城市数字建设经历了从硬件建设到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的转变,“城市”与“人”的元素日益凸显,城市文化要素的数字化开始受到重视。例如,对历史建

① 陈真:《基于地理空间框架的城市规划信息平台研究》,《测绘通报》2012年第3期。

② 郝寿义、马洪福:《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机制与路径探索》,《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3期。

③ Schaffers H., Komninos N., Pallot M., et al., “Smart Cities and the Future Internet: Towards Cooperation Frameworks for Open Innovatio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1, pp. 431-446.

④ 许晖、郭铁成:《IBM“智慧地球”战略的实施及对我国的影响》,《中国科技论坛》2014年第3期。

筑、物质文化遗产^①和博物馆及其藏品的数字化^②,都是运用数字技术对城市文化资源进行采集和处理;在文创产业与数字化的激烈碰撞中催生的基于新型数字技术的城市艺术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公共文化项目^③,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在智慧城市阶段,城市文化数字化的重点是“数字化”而非“文化”。上述数字化开发和以技术为主导的文创项目,其本质都是对技术迭代的应用和反馈,既没有对社会生活产生普遍影响,也没有引起理念和模式变革。尽管文化要素已参与到城市数字化中,但仅作为被记录的对象和产业资源,城市文化的概念和定位在其中并不清晰。换言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文化数字化依然是以技术主导、自上而下推行为主,是对文化有形承载物所蕴含的信息的数字化采集和处理,或结合数字技术对文化的有形化创新,并未真正触及城市文化的核心,也未介入城市文化的生成过程,因此对丰富和发展城市文化的贡献十分有限。

(三)系统转型: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及特征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构建“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④。相较于早期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新型智慧城市(innovative smarter city)是利用数字技术对城市进行系统重塑,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和“改革创新”的核心价值,标志着城市数字建设从技术导向、项目驱动转向系统性、协调性的新阶段^⑤,城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数字化转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数字中国”纳入国家发展蓝图^⑥，“十四五”规划则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力,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全面变革^⑦。

2021年,上海市在《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中率先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从经济、生活和治理三大领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广州、青岛等城市也相继加入:2021年6月,《青岛市“十四五”信息化规划》印发,提出了“全域赋能”概念,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⑧;2022年1月,《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⑨。尽管上述文件并未明确提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但“城市”已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独立主体,确立了“全域”理念。直至2024年,《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发展要求^⑩,标志着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发展进入系统、完整的新阶段,全方位突破了早期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理念桎梏,将城市数字化实践提升到全新的逻辑层面。

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我国城市数字化建设与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虽与“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两阶段有质的差异,但仍是以前我国城市数字化发展实践为基础,并非否定和脱离既有数字化成

① 高益忠、陈明辉、黄燕:《东莞市历史建筑数字化保护研究》,《测绘通报》2021年第7期。

② 孙权:《北京都市空间与历史文化记忆——数字时代的首都博物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 车朝春:《城市文化中公共空间艺术的数字化发展——评〈公共空间设计〉》,《中国教育学刊》2021年第8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⑤ 《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形势与政策建议》,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005/t20200515_1228150.html,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⑧ 《青岛“十四五”信息化规划发布 建成位居全国前列的数字城市》,http://news.bandao.cn/a/515138.html,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⑨ 《广州立法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107/c1001-32325766.html,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⑩ 《国家发改委 国家数据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http://www.scio.gov.cn/live/2024/34406/wjzc/202407/t20240726_856576_m.html,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果和城市发展的客观实践。具体而言,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城市的整体性转变,借助数字技术在现有城市数字化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转变,以实现城市变革性升级和重塑^①。城市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数字化已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城市生活品质的要求转化为系统性的数字化提升,形成了自下而上倒逼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动力,传统的“自上而下”推行模式已不足以解释我国城市数字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世界一度引发数字化热潮^②。“文化”往往是构建虚拟世界的关键着力点,使其成为现实世界中文化数字化的重要推手。基于物质空间与数字技术共同形成、能够突破界限限制的虚拟世界可能会彻底改变社会运行模式^③。然而,现阶段虚拟世界中的“经济”“生活”“社区”等元素仍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映射和镜像,若要发展为一种大转型的生产力,需通过根本性变革来替代,而非简单模拟或增强现实世界^④。基于文化生态理论,不论是以现实城市系统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还是以数字投射为动力的虚拟世界都为数字时代的城市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但现实社会中的城市仍然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活动的中心^⑤。现阶段,虚拟空间尚无法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⑥,也无法改变数字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边缘地位,反而可能造成现实与虚拟割裂的隐患^⑦。因此,立足于现实城市而非虚拟世界是在数字化语境下探讨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这种立场并非抗拒数字化潮流,而是将数字红利转化为现实世界发展推动力的基础。

(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的城市文化数字化特征

第一,政策引领,以顶层设计引领城市文化发展。2022年,《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将文化数字化确立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并明确其推进方向。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数字技术与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到2025年数字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2035年实现文化数字化充分协调的目标^⑧。2024年,《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提出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城市文化特色,加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应用,丰富数字产品和服务^⑨。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文化数字化升级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也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构成,具体内容和形式日益清晰。自此,城市文化数字化真正成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标志着从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向以文化本身为核心的根本转变。城市文化在数字化中超越了技术创新,成为城市未来竞争的战略资源,是城市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塑造核心定位的关键^⑩。

第二,以人为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强调“人”与“生活”,从本源上促进城市文化发展与数字化趋势的结合。“人”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在城市文化变迁中不容忽视。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

① 顾丽梅、李欢欢:《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科学发展》2022年第2期。

②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汉语盘点2021”年度字词揭晓》,《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④ 朱锐:《工具、道具、元道具:人工智能艺术的技术本质及其创新能力》,《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5期。

⑤ 刘士林:《人民城市:理论渊源和当代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⑥ 侯鑫、曾坚、王绚:《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建筑师》2004年第5期。

⑦ 谢新水:《虚拟数字人的进化历程及成长困境——以“双重宇宙”为场域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⑧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 http://www.scio.gov.cn/live/2024/34406/wjzc/202407/t20240726_856576_m.html,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⑩ Meng T., Yu D., Ye L., et al., “Impact of Digital City Competitivenes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Evidence from China’s Emerging First-tier C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 10(1), pp. 1-26.

中对“人”与“生活”的强调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关键助力,自下而上的人民力量已对城市文化变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较于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时期,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时期打破了我国城市数字建设历史上以技术为主导、侧重物质构成、自上而下推行的传统模式,以生产、生活、治理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三大转型领域,从政策上满足当前城市数字化发展要求,也为城市文化数字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式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文化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契合。在数字化的趋势下,这种政策变革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使得城市文化能够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获得新的生长点和创新动力。

第三,应用普及,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对生活、生产的全方位渗透,激活了文化消费市场与公众参与热情^①。相较城市数字化建设前期,公众获取数字技术的途径更为广泛,技术革新与应用的速度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以网络短视频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近三年来我国网民规模和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持续上涨。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53亿人,呈现全民化趋势^②。使用网络平台发布和记录自己生活和工作等内容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日常环节,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参与城市文化生成的便利性和积极性^③,公众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兴生产力,使城市文化社会化生产成为了可能。此外,文化的消费属性也随着网红打卡文化而显现。人既是文化的生产者也是文化的消费者^④,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供需双方即时沟通成为可能^⑤。例如,自媒体平台日益增多的城市打卡内容,往往是以游客视角发布城市图片、视频,慢慢积累成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吸引居民和游客模仿拍照或拍视频在网络平台分享打卡。此刻,游客在消费城市文化的同时转变为城市文化的生产者,而隐藏在此背后的经济利益也吸引政府、商家、居民自发对相应的文化场景和产品做出改变,继而使城市文化接替演化。

五、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展望

文化是不断更新的,其发展演变与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⑥。城市本身是城市文化的形成环境,一座城市的文化演变与城市发展建设环环相扣。文化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自数字城市概念提出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城市数字化发展,我国城市文化数字化已具备一定基础,并将在以城市为主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中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立足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实践,建立和完善城市文化政策布局

随着数字中国和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文化数字化已成为数字时代我国国家战略的关键一环,具备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相关政策保障和监管措施也更为完善。正如城市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综合载体,城市文化数字化也成为文化数字化工作推进的实践单元。在《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的共同推进下,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将进一步明确城市文化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定位。符合城市文化特性、适应文化更新要求、契合文化消费需求的数字化保障与监管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而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数字化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支持。

① 董天策:《新媒体与文化生态的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期。

②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0日。

③ 郑宏民:《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与大众重塑》,《传媒》2020年第22期。

④ 焦勇、刘忠诚:《数字经济赋能智能制造新模式——从规模化生产、个性化定制到适度规模定制的革新》,《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⑤ 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⑥ 左攀、郭晓:《“沧浪之水”今何在?——文化生态系统视域下的文化生成、传播与实证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二）以人民需求为核心、技术为工具，提高城市文化数字化成果普惠性

技术渗透能够打破传统习俗，塑造新生活方式^①，但随着城市生产生活对技术的依赖，也使城市文化面临沦为技术附庸的风险^②。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城市文化的内在构成难以被数字技术完全识别^③。因此，城市文化数字化工作应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通过建设数字文化中心、虚拟教育平台、鼓励数字内容创作等手段，使城市文化数字化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教育、文化生活多元化等方面真正惠及公众。此外，以老年人、贫困人口等为代表的数字弱势群体要受到更多关注，通过改造适老化数字设施、制定数字帮扶政策等措施，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减少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中的不平等和部分人群失权现象。

（三）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打造城市数字品牌，实现城市文化跃级发展

文化是一种极具操作性的消费品。城市文化数字化生产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基础，极易被获取和模仿，存在严重的同质化问题。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对文化数字化的系统认知，鼓励挖掘城市特有的差异化属性和价值。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了信息流通与资源配置，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激励公众参与价值创造，利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充分沟通^④。例如，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可以为城市带来流量，即使城市原有文化资源丰富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也都获得全新的发展契机。以西安、天津和淄博3市为例，“长安三万里”“天津大爷”“淄博烧烤”等现象级话题都催生了新的城市文化标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有发展差异。由此可见，数字语境下的城市符号化趋势淡化了现有差异，为城市文化跃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六、结语

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将文化推至国家数字化战略前沿。在数字浪潮席卷下，技术主导的前期数字建设已无法适应城市数字化需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基于二十多年的城市数字实践基础，对城市数字化发展需求的积极响应，为城市文化数字化开辟了新天地。在数字中国和文化强国战略推进期，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的系统构成和差异化竞争资源，在城市数字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如何布局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仍在探索中，无论是政策的创新还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都预示着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将推动城市文化数字化焕发新的生机。在数字逻辑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演进中，城市文化的数字化发展也呈现全新特征，技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机制，为城市文化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因此，从文化的形成机制出发，将城市文化数字化作为一个独立议题，借助政策节点厘清城市数字化转型历程与阶段特征，是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中夯实文化发展逻辑的基础和前提。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继续结合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实践，持续探索城市文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以解决数字化转型中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脱节的问题，借此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发展潜力，为城市在数字时代的竞逐中提供独特优势。

①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② 张鸿雁：《人类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论——城市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新视角》，《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③ 郑磊：《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路径与方向》，《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

④ 王宁：《分享经济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n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volution

Xu Feng Dong Yujie Zhan Cui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Cities are the fundamental carriers and practical units of Digital China, playing a central role in the national digit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Urban culture, as a key component of urban systems, is not only essential to the urban structure but also serves as a distinctive factor of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igital era. China is currently at a pivotal stage in Building up China's Cultural Strength and Digital China, while culture digitaliza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a vital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digitalization, urban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viewing the urban digitalization progress of China, there are three major stages: digital city, smart city and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work of digital city emphasizes on collect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constructing digital space based on urban city, while th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n this stage is limited to recording spatial elements. During smart city development, digital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enhance urban operations and create intelligent urban system, whil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primarily involves the digital recording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roducts.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systemic upgrade of urban system. In this stag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evolves from a secondary component to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urban system, emerging as a key factor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Cultural ecology theory offers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emphasizing that culture developmen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roots in residents' lifestyles,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dvances with the spread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urban life.

Looking back on the urban digitalization progress of China,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cross these stages. In both the digital city and smart city phases,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s an auxiliary element of urban digitalization, driven b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top-down approaches. During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three cruci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policy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establishe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urban digitalization. Second,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integrates top-down and bottom-up processes to promote urban culture digitalization. Third,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new 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reshapes lifestyles, revitalizing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ile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urban culture digitalization in Chinese cities reflec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ynergy of policies,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creates new spaces for cultural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paths to make cultu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orm a distinc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Urban culture; Digitization of cultur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ecology

[责任编辑:郝云飞]